

“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6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育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3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新意颇多。

大会主题突出了明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在此视野下,发生于明代中国的地区性事件就具有了世界性意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万明《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商品、商人与秩序》质疑将明代官方朝贡贸易与民间走私贸易分开的研究模式,从世界大变迁的视野把晚明中国的海上力量看作官方与民间力量的整合状态,提出晚明中国从海上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货币白银化、月港开海等一系列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密切相关,晚明海上力量在与西方海上势力角逐中,毫不逊色。北京大学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北虏”问题》突破了将明代“北虏”问题仅仅放在明蒙冲突关系中加以探讨的研究视角,注意到所谓“北虏”蒙古与明朝以外地区如新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诸国间的联系。他从明、蒙之间的互市问题入手,提出蒙古通贡开市的需求有可能是要重新开辟由它所控制的欧亚大陆贸易体系,蒙古开市代表了亚洲内部城镇化的趋势,将业已存在的民间走私贸易合法化,纳入国家体系之中。东北师大刁书仁《十六世纪中叶朝鲜使臣赴明的白银私贸》关注16世纪中叶白银匮乏的朝鲜,一些赴明使臣何以携带大量白银到中国进行私人贸易。认为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通过白银作为通货与商品,构建了一个朝鲜—明朝—日本的贸易网络,日本鼓励贸易,希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式朝贡体系。澳门大学汤开建《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游及影响》利用葡萄牙文材料,梳理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的总体脉络与细节,提出利玛窦向徐光启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神学思想,使得徐光启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全家信仰基督教,徐光启对于传教事业十分热心,甚至关注对交趾、占城、朝鲜的传教活动。南京大学夏维中《南京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响》主要通过约翰·尼霍夫《荷兰共和国东印度公司大使晋謁中国皇帝——鞑靼大汗》这本游记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来探讨中国明朝南京琉璃塔在海外的影响,考证了南京人把琉璃塔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信息来源。南开大学庞乃明《环球大视野与晚明新思维》论述自16世纪全球化以降,晚明知识阶层的环球视野初步显现,由此引发的新思想、新观念开始生发并不断成长,其中包括呼吁向西方学习、质疑中国独尊地位、警惕来自欧洲的非传统威胁等。韩国学者金晳绿《明初洪武帝对朝贡制度的整备及以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成立》认为,明初洪武帝重新规定朝贡制度,以礼制为原则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才出现了所谓国际关系。礼制之“礼”有权利和义务两层含义,过去认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具有绝对的权力是不符合史实的。东北师大刘晓东《谢杰与〈虔台倭纂〉的形成》探求明代江西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倭患程度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何以编写了一本详细介绍日本情况的《虔台倭纂》,其知识从何而来,涉及了明代中国关于日本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传播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彭勇《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总结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对于郑和的研究,提出郑和形象有二:一为“文献郑和”,这是从文献中梳理出的历史上真实的郑和以及他的基本事迹,一为“文化郑和”,这是时代赋予郑和文化使者等意义从而构建出的郑和文化。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议题是在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角度下对明代历史的重估。南开大学南炳文《过去、当代、未来三个角度看明史》在总结了前人对于明史或褒或贬的评价之后,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国际背景,总体上以肯定明朝为主,特别针对过去将西方的科学理论优于中国作为明朝落后于西方的论点,提出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欧的先进科学理论要转化成实际应用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明代中国在技术层面上还是领先于世界的。江西师大方志远《明朝百年启示录》梳理了明朝前一百年的发展历程,注重明中期在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官、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在明中期交错在一起,使明中期的发展脉络迥异于前代。韩国学者吴金成《社会变迁视角看明中期史的再认识》同样表现出对明代中期历史的兴趣,呼吁学者关注明中期社会变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商传《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考察了晚明时期国家权力的实际作用以及民间产生的新情况,提出在社会变化和社会利益重新组合的大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异化使得国家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侵夺。东北师大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以“帝制农商社会”概念来概括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指出其基本特征是皇帝—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生态。

更多的论文内容属于个案研究,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建筑、祭祀、移民、学术思想、地方社会等诸多方面。关于明朝边疆问题的论文有:黑龙江大学胡凡《明蒙朝贡体制与明代农牧文化融合》指出明蒙之间的朝贡体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时段,几经波折,直到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才真正确立。北京大学李新峰《明初辽东战争进程与卫所设置拾遗》以明初辽东史料为例,从三个方面尝试拓展明初史料的利用空间,即严格取舍原始史料,发掘不同记载的互补效能,区分概念所指以解读貌似矛盾的原始记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赵现海《明前期西北中国的边缘化与河套周边的经营》通过对于河套地区自西夏至明数百年历史的梳理,分析了明朝对于河套地区管理较为薄弱的历史原因。明初沿袭宋代的边疆政策,将河套居民驱逐到河套以北,形成无人区,建立军事防御地带,试图修正后人把明中期以来的套虏问题归咎于永乐帝迁徙边疆卫所的传统看法。厦门大学刘婷玉《内无应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由俞大猷抗倭期间的得咎、起复谈起》由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王江泾大捷之后的获罪、起复事件,揭示了以徐阶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方势力在此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社会经济方面。故宫博物院赵中男《明代宫廷新政初探》通过对于明朝新皇登基颁布的诏书以及虽无明诏但实际执行的一系列宫廷整改措施,探讨明代宫廷新政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东北师大罗冬阳《明代两淮盐政变迁中的国家、资本与市场》通过对万历四十五年确立的两淮盐政纲法的剖析,提出在万历时期袁世振盐政改革中,国家、大资本、小商人、边镇文武官员与市场间的利益达到一种新的均衡,而这一切是明代绅商社会内在的行为逻辑,虽然受到了外来白银的影响,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是主要原因。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行会”抑或“役籍”?——关于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通过对行会的历史与定义梳理,指

出无论是宋代的“团行”还是明代的“铺行”都仅仅是官府强制编置的、功能单一的赋役组织,甚至不能算是一种实体,根本算不上工商合作组织。清华大学余清良《明代“铺”、“境”、“社”含义考辨》考察了明代基层乡治组织“铺”、“境”、“社”具体含义与功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金奎《明初山东枣强移民小考》指出枣强籍移民大量迁入山东的时间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并非“洪武二年移入”。其原因是,明中期以后政府欲控制人口,下令迁徙之人返回原籍,但迁徙之人不愿离去,故虚构出自洪武二年就已经迁入此地的先祖来证明本族移入已久,以求长居此地。

社会思想与文化方面。吉林大学王剑《明懿文太子陵祭逾制考论》试图揭开南京明懿文太子陵一年九祭皆用太牢这种超越常规的祭祀礼制形成过程,以及隐藏其中的政治动因。东北师大李媛《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关注明代孔子祭祀使用塑像还是木主的问题,剖析明代统治者思想变化以及地方的回应。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时龙《明人对书院的态度——以明代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以明代方志中的书院记载为基本参考资料,举出土人对于书院的三种态度:书院非制、属于官方学校的辅助、书院是祭祀先贤之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解扬《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使用追求——以冯琦(1558—1603)〈经济类编〉为中心》考察冯琦所编纂《经济类编》内容,通过书中收录材料的选取、分类、编纂来分析冯琦的编纂指导思想与书籍应用。东北师大赵克生《从“木铎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在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探讨了明代圣谕宣讲不同模式的演进,即由明初的“直言叫唤”发展为嘉靖以后的“阐明事理”、“讲行合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新境界,圣谕演绎之学渐趋形成,不同风格的圣谕讲本广泛传播。天津人民出版社张献忠《救亡压倒启蒙——晚明至清初思想的演变路径及其阐释》借助李泽厚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展脉络的概括“救亡压倒启蒙”来分析总结晚明至清初思想的演变路径,提出晚明思想属于启蒙思想,具有近代性、内生性的,源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兆裕《〈崇祯长编〉的佚文述记》对《行水金鉴》、《钦定续文献通考》及四库本《明史》所附《考证》三种清代史料中摘引的《崇祯长编》内容归类整理,部分还原了《长编》的佚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之间的讨论一直洋溢着肯定与批评的热烈气氛,既深入研讨了学术问题,又弘扬了良好的学风。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赵克生、宋继刚)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11年12月10—11日,“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在宁波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局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波博物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地的近40位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就以下6个专题